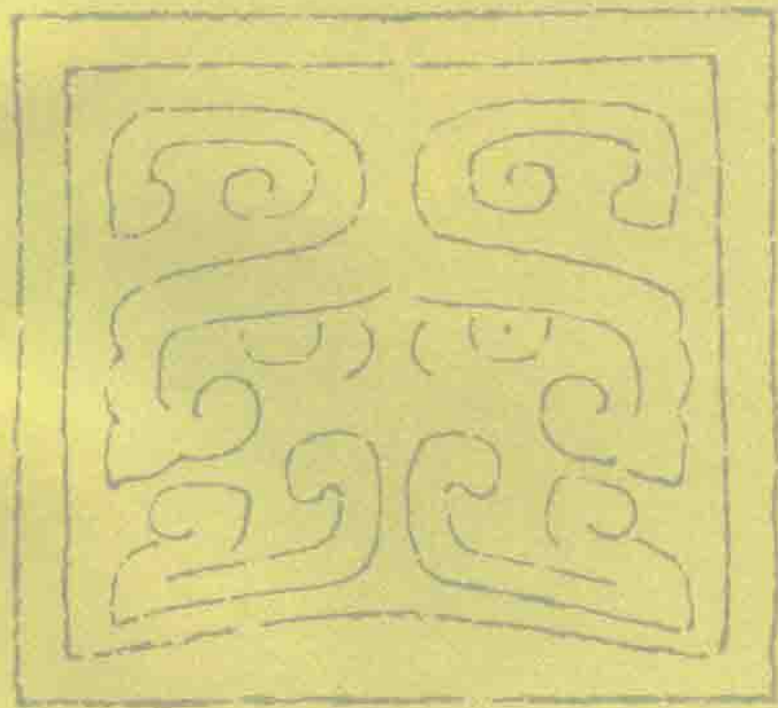


杨慎诗选

王文才 选注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王文才 选注

杨 慎 诗 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责任编辑：戴安常

杨慎诗选

王文才选注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印张 7.5插页4 字数153 千

1981年4月第一版

1981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450册

书号：10118·383

定价：0.85元

杨慎诗选序

杨慎生平事迹，具详本编附录简绍芳所撰《升菴年谱》，兹不赘叙。所要说明的是，关系其终身罪谪和影响诗歌内容的“议礼”问题。

议大礼是指议论明世宗生父的庙号和相应的祭礼，表面上不过是封建礼教名分的争论纷歧，实际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。以议礼为焦点，集中爆发了明代中叶皇权、宦权和阁权的尖锐冲突，并又带入新进集团和内阁旧臣的矛盾，把虚伪礼制的争议过程，变成了错综复杂的夺权过程。因之议定颁行，反复数变，借事生波，经历七年。

明武宗死后无嗣，世宗由宗藩继位，即位后六天（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）下诏礼部，命廷臣集议自己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。以首辅杨廷和与礼部毛澄为首的府部群臣六十余人，一致认为“宜称孝宗（武宗的父亲，兴献的哥哥）为皇考，改称兴献为叔父”（《明史·毛澄传》）。理由是按帝系继承制度，就该“继统继嗣”，所谓“天子诸侯有统而无嗣”。继嗣即应为前代皇帝之后，无嗣即不按藩属继承；即是说，当家族关系和帝系不一致时，须以国为重，遵从皇统。明世宗为了提高本家宗族的地位，早就存着“继统不继嗣”的私心（详《野获编》卷二），欲图新建宗系，尊称生父为兴献皇帝，几次命廷臣改议，都遭到反对。这时恰有在京伺机上进的

“观政进士”张璁，窥测世宗“锐意尊所生”的心理，上议献谄，主张应称孝宗为皇伯，改称兴献为皇帝，立庙享祭，附和者主要是桂萼、方献夫、席书、霍韬几个理学秀才。两种意见针锋相对，从七月起到次年嘉靖改元，多次廷议，内阁派坚持国家制度，不能“任私恩而弃大义”，以小宗代替大宗；新进派强调孝悌伦常，宣称礼“不废其尊亲”，要以藩属代替帝系。九月里，世宗以“避位归藩”要挟改议，张璁更提出“非天子不议礼，愿奋独断”的专横办法（见《大礼或问》），内阁和部臣才退让一步，尊称兴献王妃为帝后。世宗总希望能在帝后上加一皇字，再次引起群臣的反对，谏者百余人。世宗勉强暂从廷议，于二年正月下诏称本生父母为兴献帝后，以孝宗为皇考。

大礼初定，潜伏的矛盾却在继续发展。杨廷和在议礼中封还御批者四，执奏三十疏，显示了阁权的作用，世宗不能满足私愿，“常忽忽有所恨”，意亦内移。张璁因议礼骤升南京刑部主事，与原刑部主事桂萼、兵部右侍郎席书等相聚于南都，结成集团，一心要争名于朝，搞垮内阁，攻击廷臣，请求改议。“自时厥后，诸希宠干进之徒纷然而起，失职武夫、罢闲小吏亦皆攘臂努目，抗论庙谟”（《明史·黄绾传》）。朝中也有人攻讦内阁，“擅威权以移主柄”。二年初阁臣集体辞职，世宗不便允许，却逼走了毛澄。抛开封建礼教理论的是非长短，从政治上观察，内阁旧臣是比较正派的，新进集团是适应皇室宦侍的需要登上舞台的。他们攻击阁臣，目标是指向着刚付施行的“新政”强行法制（详后），所以世宗即予废除，“收回成命”，恢复过去的特权，扶持自己的势力。正如杨廷

和《请慎命令以保新政疏》中指出：“政令纷更，徒尔滋弊长奸。（新任）不曰藩府之旧人，则曰戚里之私谒”（见《杨文忠公三录》卷二）。这时宦官崔文等也重新活跃于内官，群臣抗疏，反被下狱。廷臣为保护法纪，也指向皇族和宦党的不法行为加以弹劾，刑科请罢中官出镇和锦衣侵夺三司职权、检举后父纵奴杀人，户科请还投献与侵占的田庄等，世宗一概不听。特别是十二月中，敕遣内织染局宦官往苏杭五府灾区提督织造，征派物料工役，廷和抗疏：“准指邠徐诸府军民房屋田土淹没殆尽，百里之内断绝炊烟，卖子鬻女辄以斤计，至于相视痛哭，投水而死”；人民已困于水火，不能再遭额外压榨。世宗不顾一切，孤意执行；廷和虽不奉命，终于没有争胜，三年二月便辞退还乡了。杨去位后，世宗立即令廷臣改议，讨论南京方面的主张：称兴献为“皇考”，去“本生”谥号。在这次激辩中，杨慎奋抗暴君，痛击邪曲，表现其“见义不敢后身”（见《自赞》）的政治品质。

重新集议大礼时，以礼部尚书汪俊、吏部尚书乔宇和侍郎何孟春为首的二百五十多人，上了八十多封奏章，坚持“宜考孝宗”，只本“本生父母”上加增“皇”字。世宗尚欲废去兴献旧号，改称“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”，建庙奉主于大内；张璁则扬言，所争“不在皇与不皇，惟在考与不考”，能以兴献为考，自然会追尊为皇帝。于是一面惩戒对抗旨意的官员，罢去汪俊和大学士蒋冕，并将礼部侍郎吕楠下狱。一面从南都调来张、桂，六月至京，力请“伯孝宗，考兴献”。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等七十余人奏劾张、桂，反被升擢为翰林学士，这更激起了翰院的强烈反对。学士丰熙和修撰杨慎等三十六人联名抗

议，以去就力争，受到罚俸的处分。七月十二正式下诏去“本生”称“恭穆皇帝”，群臣争议不从，桂萼乃请召对大廷。十五日在威力控制下的集议，台谏府部数十人毫不屈服，张、桂以十三罪斥廷臣为朋党，何孟春等一一难之，相持对立，群情汹汹。

“朝会方罢，孟春倡言于众曰：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，争慈懿皇太后葬礼，宪宗从之，此国朝故事也。修撰杨慎曰：国家养士百五十年，仗节死义，正在今日！编修王元正、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，谓今日有不力争者，必共击之。孟春、金献民、徐文华复相号召。”

（《明史·何孟春传》）

于是九卿、翰林、给事中、御史、诸司郎官、六部、大理等二百二十九人跪伏左顺门请愿。阁臣毛纪、石琚等，因礼部侍郎朱希周的催请，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，从辰至午，不肯退散。世宗派锦衣卫前来镇压，捉捕领头的丰熙、张翀等八人。议礼发展成狱，杨慎和王元正“撼门大哭，众皆哭，声震阙廷”，以示反抗暴力。又被收囚一百三十四人下锦衣卫狱，令何孟春等八十六人听候处罚。赓即举行上皇太后尊号的大典，左都御史金献民、侍郎朱希周何孟春等硬不赴阙行礼。世宗无所发泄，十七日廷杖杨慎等一百六十余人。过几天，从安陆藩府迎来了兴献的神主，奉安于观德殿，世宗余怒未消，二十七日再杖带头聚众伏哭的杨慎等七人，先后有十八人死于酷刑之下。同时左谪废黜一百八十人，以杨慎谪戍永昌，“永远充军”。九月十五，新任礼部席书至京，主持廷议，纠合贵族公侯，按世宗旨意上议定礼，歌颂圣德。世宗施逞淫威在刀光血影中建立了

新的帝系，赏酬张璁参予机务。京中传出一首童谣：“太庙香炉跳，午门石狮叫。好群黑头虫，一半变蛤蚧，一半变人龙。”暗喻帝系建成后，宗庙祭典大变，朝堂之上杀声喧腾，群臣逆旨者伏地叫苦，顺意者乘云发迹。这对议礼是多么幽默的讽刺。至嘉靖七年，颁布《明伦大典》，重定义礼诸臣罪名，以杨廷和为罪魁，削籍为民，旧臣中大学士蒋冕、毛纪，尚书毛澄、汪俊、乔宇、林俊及何孟春等，俱被夺职。

显然，整个议礼过程中的剧烈冲突，不单纯是违抗了世宗个人意图而激成，在议礼的大题下，已把统治内部蕴藏着的各种深刻矛盾表面化了。追溯根源，由来已久。

首先是皇权与阁权的矛盾。明代中叶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百年之间“天下额田已减其半”。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，君权更趋极端专制，宦佞势力也乘机而兴。正德以来，暴政荒淫，法制尽废，内阁六部形同虚设。皇室贵戚宦官权豪疯狂掠夺，流民百万，义兵四起，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已全暴露。农民革命对地主政权的沉重打击，迫使部分臣僚正视弊政，试图整顿，维持法纪，挽救时局，用以缓和矛盾，巩固统治。正德十六年的“新政”措施，就是在这样形势下发生的，在特定的环境里，表现为极端专制与国家法制的矛盾。

原在正德初年，首辅李东阳力弱，不能与宦党相抗，因援杨廷和入阁共事，倚以自强。廷和为人沉静详审，考究民瘼，“于当代典章条格，人才政绩，边防阨塞，军伍钱役，丛琐远近，心计耳濡”（见赵贞吉《杨文忠神道碑》）。他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，锐意整饬朝纲，实行法制。入阁后先诛刘瑾，“阁权始专”。及为首辅，武宗南北巡游，天下骚然，“廷和颇以

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推服”，稳住了局势。武宗天亡，迎立世宗，“帝之末至京师也，廷和总朝政者三十七日，中外倚以为安”。趁此开展一系列的政治改革，雷厉风行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分的皇权和贵族特权。这次改革，严惩窃权的宦官，革除皇店，放豹房番僧与教坊乐人，释南京系囚，遣还四方进献子女和各国贡使，停不急工务，收行宫金宝，“诸非常例者，一切罢遣”，凡“正德中蠹政，厘抉且尽”。接着公布廷和预拟的世宗《即位诏》，规定“新政”纲领：减免税赋，裁减冗兵闲官，停陕西织造和夤缘监织榷税，以及内监局旗校工役，节制冗费，清理盐政漕运和部分皇庄官庄，慎刑审，开言路。总共“裁革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余，岁省大仓粟一百五十三万余石”（见神道碑）；其中革去锦衣诸卫冒滥军功将校三万余人，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斥去。史称“世宗御极之初，力除一切弊政，天下翕然称治”，指的便是这次整顿工作。而廷和本人，因“其诛大奸，决大策，扶危定倾，功在社稷”，历史自有定评。但由于“新政所厘正，多不便于奸豪贵幸之家”（《嘉靖实录》二），包括皇帝在内，相对地削减了一些权利。明世宗决不甘心放弃高度集权，奸豪贵幸也要夺回失去的特权，依附在新君周围，伺机报复。借议大礼，改组内阁，排斥旧臣，废除新政。因此，内阁诸臣在议礼中的失败，实质上是新政和法制的彻底遭到破坏，树立世宗个人的绝对权威。

其次是宦官和朝臣的矛盾。明代宦势炽盛，窃夺政柄，实权在内阁之上，成为国家的毒瘤。自永乐后阉人掌握厂卫，挟制廷臣，司礼监俨然是皇帝的代理人，大权旁落。正德时，刘

瑾领内厂，势倾内外，“八虎”横行，党羽四布，法纪尽废，怨满天下。凡廷臣有所奏议，“稍涉权贵”，及为“权幸所不便者”，便不得行，并遭横祸。杨廷和诛刘瑾，仍没有改变宦倖操纵朝政的形势，及其摄政时，首先向篡夺军政大权的宦官佞倖开刀，逮捕锦衣卫钱霖和宠臣江彬，夺回军权，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和军门办事官，入卫的边兵遣还归镇，并诛钱江二凶。司礼监张雄、东西厂张锐谷大用和创设皇店的于经等群小，分别下狱定罪，邪恶势力受到一次清洗。议礼中，宦竖躲在后宫作怪，成为一股暗流。世宗有意包庇和加以纵用，让这些群爪牙卷土重来，不达到压倒朝臣中的正派力量决不罢休。

第三是新进集团和旧臣的矛盾。世宗靠内阁的支持入嗣皇位，既要独揽大权，必先解除内阁的牵制，第三种政治力量便应运而生。世宗“故贵张、桂诸臣，以招徕天下”（《野获编》卷二），目的是培植自己的羽翼，并使他们去打击旧臣，驱逐内阁，坐收渔人之利。张璫桂萼一伙工巧逢迎的新进官僚，利用议礼从南京打进中央，新旧集团势不并立。廷和去职，表示内阁倒台，亦无异于宣告新政失效。所以第二次议礼中争斗更为激烈，廷臣坚持维护旧议，意味着保卫阁权，打击新贵。礼定后，张璫即得重用，嘉靖五年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，立即罢三法司、兴冤狱以陷旧臣；六年又清洗翰林、御史，起用张永。八年桂萼继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，新进集团全面得势。“议礼贵人”一登朝阁便设计构狱，排陷异己；引私结党，专权招贿；勾结宦官，起用奸权；无不适应新君宦党贵倖的需要。世宗的绝对权威通过议礼得到巩固，从此深居内苑，指使阁臣，任其所欲而为，已无法纪可

循。

杨慎从嘉靖三年出贬，迄至三十八年卒于永昌，谪戍终身。自嘉靖四年到二十七年，不断有人奏请赦免谪戍诸臣，上言者往往得罪，决不让内阁派重新入朝。对于杨慎，由于他在旧臣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号召力量，更不肯放松他。嘉靖十六年，新进派的要角都已致仕，刑部请赦还谪戍一百四十二人归田，独不宥丰熙杨慎等八人。世宗尤恨之入骨，每问“杨慎云何？”时时注视着他的言行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。他虽处于极其困危的境地，却坚持原则，始终不渝，从没有表示过屈服，也没有改变既往的议论。在长期流放的岁月里，胸中无限愤怒，不敢露骨泄恨，所谓“壮心不堪牢落”，只落得佯狂自纵，以避暗害。这种遭遇决定了他诗歌的内容：忧愤贬谪，不甘屈辱，赋物写情，隐喻不满。所以当他身居玉堂，还能写出鲜明讽刺武宗的诗篇；出贬以后，反而不敢公开指议朝政，即使讽陈时事，亦较含蓄。然而长期废居边地，奔走旅途，却更多接触到穷乡僻壤劳苦人民的生活，为他的创作增加了新的血液。祖国西南的雄丽山川和边疆风物，为前人作品中所鲜见者，正待杨慎的篇什去填补诗史的缺页。也无可讳言，多数抒写个人哀怨之作，不免带有颓丧情调，无妨从当时残酷的政治压力去理解其内心苦闷。

杨慎诗的主要内容，已详选目解题，亦不复述于此。只就其在明诗中的地位和艺术见解，试为阐述。

明代诗歌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即在唐宋诗的基础上，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，建立新风。因而出现不同的主张和流

派，促成明诗的递变。《明史·文苑传序》等著对此有较平允的概述云：明初犹存元人余习，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。永乐以来，崇尚台阁体，演迤气弱，肤泛不振。弘正间，李东阳振兴唐诗，擅声馆阁，有承先启后之功；其论诗歌音调，实开七子先声。正德嘉靖为明诗亟盛时期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，称雄一时，凡中唐后作一概屏弃；边贡徐桢卿为之羽翼，天下翕然宗之，诗风一变。但流弊每多雷同，徒存格调。继以王世贞李攀龙诸人与李何相应，诗主盛唐，同样未能变化，缺少自然之趣。当时能自异于流尚，别树一帜的，只有杨慎影响较大，同时代的诗人对他莫不倾服。

薛蕙《升菴诗序》：“国朝能诗者，盛于弘治正德之际，数君子为有功矣。然此数君子亦各有高下，学有疏密，虽其高才嗜学者，要未有穷其学之所至，竭其才之所能者也。升菴先生穷极词章之绮靡，可以见其卓绝之才；牢笼载籍之菁华，可以见其弘博之学。此其意将欲追轶古人，而不屑与近代相上下，唐之四杰，不能过也。”

张佳胤《跋杨用修诗卷》：“本朝文体凡数变，然莫盛于德靖间。李宾之阁老为之嚆矢，李何徐薛羽翼之，文词一时斐然中兴。其时翰林中嚆然尊古，可以嗣建安垂拱之响者，则唯先生一人。”

杨慎自幼受诗法于李东阳，不满七子局限于盛唐的主张，因由初唐上溯六朝汉魏，以博雅宏丽独步于时尚之外，抗衡七子。虽王世贞也得承认：“杨修撰之《南中》稿，秾丽婉至”；“凡所取材六朝为冠，固一代之雄哉！”（《艺苑卮言》）七子流派中的胡应麟亦称其诗：“清新绮缛，独掇六朝之秀”；

“才情问学在弘正后、嘉隆前挺然崛起，无复依傍，自是一时之杰。”（《诗薮》）反对七子的钱谦益，对他尤为推崇。

《列朝诗集》丙集十五：“及北地哆言复古，力排茶陵，海内为之风靡。用修乃沈酣六朝，揽采初唐，创为渊博靡丽之词，其意欲压倒李何，为茶陵别张壁垒，不与角胜口舌间也。其藻彩繁会，自足以牢笼当世，鼓吹前哲。”

慎诗沈酣六朝，并具卓绝之才，故能取得独有的成就。清代一致公认他的这种特殊成就，是建立在雄厚的博学基础上的。《香祖笔记》云：“明诗至杨升菴，另辟一境，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。”《四库提要》云：“慎以博洽冠一时，其诗含吐六朝，于明独立门户。盖多见古书，薰蒸沈浸，吐属自无鄙俚。譬如世禄之家，天然无寒俭之气矣。”这些评论，都很中肯。他曾嘲笑刘须溪无六朝之学，“不知《选》诗，又李杜之所出。乃开剪裁罗段铺客人，元不曾到苏杭南京机坊也”（见《升菴诗话》）。须溪浅学鄙识，论诗自不免于寒俭局促。慎则自“选诗”而上，采揽古代风雅，杂歌讴谣，盟筮占繇，铭识赞祝，下至民谚俚语，无不留意。就明代诗学而论，他的广博应在七子之上。所取既博，又自融会成体。他尝告诉友人张含：“诗，吾愧风雅，独夷鲍谢”（张含《南中集序》）。所得力处，本在六朝新体。

杨慎前期的作品，即以规模六朝初唐为主，刻意追踪前人，绮藻丽词，宏肆渊博，自成一格，角雄诸子。但亦不免以此为累，即使是一些拟古的名作，往往偏重体式，痕迹太露，或有深意，亦伤生气。正如王世贞所说：“杨用修如暴富儿郎，铜山金埒，不晓吃饭穿衣”。胡应麟亦谓其“错采缕金，雕绘

满眼”，便指此类而言。出贬以后，诗风却有转变，初入云南之作，如《白崖》《卧佛》，感慨行旅，自然流利，已异旧调；他所标举刘勰的论旨，“五言流调，清丽居宗”，得到实践。至于那些应酬官场的诗，仍只能在锻炼词语，驱使典籍方面用功，借以弥补内容的空虚。可见只求在格调上争胜，虽高才博学如杨慎，若无新的内容，是难达于佳境的。杨慎后来也清醒认识到余风之弊：“近世知学六朝初唐，而以佶迤生涩为之，渐流于不通”（见《诗话》四言诗条）。又说：“至李何二子一出，变而学杜，壮乎伟矣。然正变云拢，而剽窃雷同，比兴渐微，而风骚稍远。嘉靖初稍稍厌弃，更为六朝之调、初唐之体，蔚乎盛矣。而纤艳不逞，阐缓无当，作非神解，传同耳食”（《诗话》引唐文荐语）。在杨慎的杂著里，有好几种摘录前人佳句丽事而成的小类书，就其本意而论，因明时士习，鲜读经训性理以外书籍，录此可以开阔士子的眼界，进而倡导博学。结果只被学艺者临文备览，藉以猎艳，甚至错误认为，升菴手握中秘藏本，惊奇眩博。通览杨慎的诗文名篇，用事借语虽极渊雅，大多出自习见之书，绝非搜异逞奇可得，由此可悟其诗理，取胜本不在此。

杨慎诗独创之处，尚不止于揽采六朝，更在融会三唐；成功的篇章，亦不专属五言，而多属七言。《说诗啜语》独许其七言，认为“五言非用修所长，过于秾丽，转落凡近也”，自有一定的理由。五言中固有较为清新之作，而歌行与七绝尤为蕴藉流利，七律雄浑工致，俱以风调取胜。

唐人擅长歌行，何景明对初唐体已有精辟的见解，认为“四子者虽工富丽，去古远甚；至其音节，往往可歌。乃知子

美词固沉着，而调失流转，虽成一家之语，实则歌诗之变体也。”杨慎探索歌行格调，不限于唐初，所作“荡放流动，汎汎乎入李白”（张含语），于苏轼的短歌亦吸取其体势，故觉面目姿态，富于同时诸家。《明诗别裁》选录杨慎七古最为精当，如《送余学官归罗江》是其古乐府杂言的名作，《垂柳篇》是辞华清美、义兼寄寓的初唐歌行。至于《宝井篇》《海口行》诸诗，包涵较多的社会内容，开阖变化，足与前代大家相媲美。清末王闿运亦深具六朝初唐诗学，明排何李杨慎，而暗趋其后尘，独以歌行擅长一代，五言虽能尽雅，终似纸上看花。其得失之处，颇与杨慎相类。

杨慎七律，雄浑蕴藉，工致绮丽。早期所作，如与何景明同赋《无题》，讽刺武宗狎妓；拟边塞诗如《塞垣鹧鸪词》，寄慨时事，皆属初唐气格。后期如《春兴》和《病中秋怀》两组咏怀诗，取材弘富，情致尤胜。盖生平论诗，以“涵蓄蕴藉”、“工致天然”为上乘（见《诗话》沈满愿、诗史及刘文房、刘方平等条），其七律之工者，真能达到这种境界。故王士禛亟称其“七言律联，神韵天然，古人亦不易多见”。他对律诗的探究很深，上溯六朝，下至初唐，通其流变。以为“黄初正始之后，谢客以俳章偶句倡于永嘉，隐侯以切响浮声传于永明，操觚轮才，靡然从之。虽萧统所收，齐梁之间，固已有不纯于古法者。时代相沿，风流日下，填括音节，渐成律体。六代之作，其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，而其体裁，实景云垂拱之先驱，天宝开元之滥觞”（见《选诗外编》序）。此论齐梁之诗，即清人《古诗选》所称“短句”，《八代诗选》所标“新体”，并包括近人所谓“宫体诗”。后世论律诗的发展形

成，莫不本于慎说。又《五言律祖序》云：“近日寻滥觞于景云垂拱之上，着先鞭于延清必简之前，远取宋齐梁陈，径造阴何沈范。”因选六朝俚律，成书十卷，以证实上述理论，示人律诗的途径。《艺林学山》称誉“此编辑六朝近律者，以明唐律体所自出。入门士熟习下手，足可尽湔晚近尘陋；超而上之，舍律而古，当涂典午，始基在焉。用修之识，致足仰也！”故所作五律，亦融齐梁初唐为一体，渐趋于老成。他说“庾信之诗，为梁之冠绝，启唐之先鞭。绮而有质，艳而有骨，清而不薄，新而不尖，所以为老成也”。出贬后诗，即向此境界努力。如贵州道中的《新添馆中喜晴》《乌撒喜晴》诸作，皆清新绮丽，为明清选家推崇备至。

七言绝句也是杨慎的特长，情韵风华仿佛三唐，于明人诗中尤属罕见。三峡《竹枝词》和《滇海曲》，摹写山川风物，真得乐府遗韵。《南狩曲》和《海估行》，讽谕遥深，吐属高华。旅程乘兴之作如《渡黄河》《于役江乡归经板桥》，别具新境；寄内及自伤之诗如《青蛉行》《梦中作宫词》，情词并美。对于唐人绝句，涵泳最深，意有所主。尝云：唐人绝句，偏长独至。“擅场则王江宁，骖乘则李彰明，偏美则刘中山，遗响则杜樊川。少陵虽号大家，不能兼善”，独取其《江南逢李龟年》一首，以为风调胜也（《唐绝增奇序》）。唐代绝句，圆浑一气，含蓄春容，自擅一代之长。至于杜甫，运古意以入近体，自具作法，异于诸家，如李东阳所言，“跌宕奇古，超出诗人蹊径”。而慎之此论，实不可易。故首先为王世贞所承用云：“七言绝句，至江宁太白，争胜毫厘，俱是神品，取称擅场，为有唐绝唱。少陵虽工力悉敌，风韵殊不逮也。”胡应麟

又从而论之，七子诸人继推压卷之作，李攀龙王世懋及王士禛沈德潜各举三唐名篇，以发挥慎说。慎论七绝，本不以时代为限，曾谓“晚唐之绝唱，可与盛唐峥嵘”，虽宋人绝句亦有可以匹唐之作。在这方面，似较七子通达。《诗话》屡言：“不可云宋人无诗”，失之过专；“亡友何仲默尝言，宋人书不必收，宋人诗不必留目”，乃故为倔强。影响所及，“好奇矜高者则曰宋人诗不必留目”（《梅圣俞诗选序》）。他的七绝所以能独步于明代，正因兼采诸家，不限于一时一格。

综而论之，杨慎以其卓绝的诗才，深研六朝的新体，具有深厚广博之学，创为渊雅靡丽之词；更能兼取众善，出入三唐，风调情韵，得其神似。诗歌内容，又多新境，为前人所未备，是以独树一帜，雄视一代。